

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

安庆，清代安徽首府，当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素有“文化之邦”“戏剧之乡”“禅宗圣地”之美誉。桐城派与徽班，更是安庆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，也是安庆地域文化上升为国家文化形态的重要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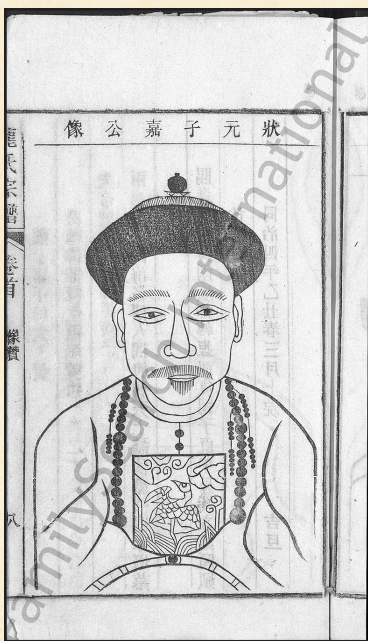
科举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，近1300年的科举史上，历代的文化精英崭露头角、汇萃于斯。明清时期，安庆即以科举名闻天下，一批批安庆先贤于科场冲金夺银，乃至摘取“状元”而名满天下。科举隆盛，本质上

是地方文化昌盛的反映，文化昌盛折射的是地方全面的繁荣。

毋庸置疑，安庆从来就不乏问鼎天下之志，也从来不乏问鼎天下的气势。开风气之先，为时代魁首，是安庆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。历史是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，为今天定位，为未来导航。隳括安庆历史上状元们的辉煌篇章，是为重拾自信，勇往直前，也是为在前行的路上，不忘低下头来，自省、自勉，从而获得更多奋进的力量。



赵文楷画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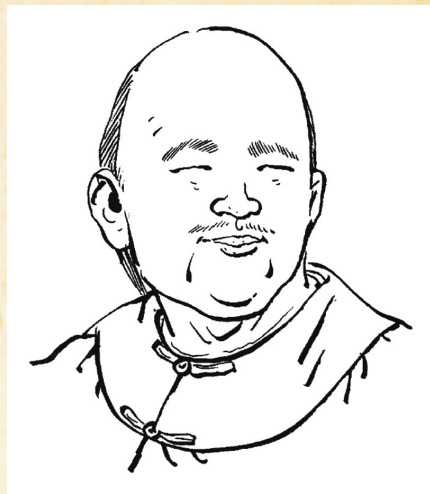
龙汝言画像



刘若幸画像



王来聘画像



李振钧画像

“为救李郎离家园，谁料皇榜中状元。”黄梅戏《女驸马》中冯素贞的一段“凡尔赛体”花腔，唱出了安庆斐美悠长的豪迈。

安庆是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，黄梅戏《女驸马》让安庆声名远播。但是，古代科举制度是严苛的，若以当下的“高考”喻科举，女儿之身的冯素贞，真要科场博取状元，她拿不到准考证，买不到车票，进不了考场。就算诸多环节皆有神助，冯素贞如愿金榜题名，她也断不敢领“录取通知书”。步步惊心，环环死结。

戏曲文化，只是安庆文化轻松欢乐的一部分。即便冯状元纯属虚构，丝毫不影响安庆科举大市的地位。隋唐开创的科举制，打破了阶层固化的桎梏，为中国历代王朝所沿袭，甚

状元
安庆

至被当作西方文官制度的源头。近1300年间，这种新的选官制度选拔出无数社会精英。成熟的科举制度，读书人的科考是“三部曲”：考“秀才”，考“举人”，考“进士”。“进士”中的第一名，即所谓的“状元”。

《女驸马》从艺术的角度，提出了一个趣味性命题：科举魁首的状元，会成为驸马？以明清科举史料观之，明代进士平均年龄33岁以上，清代进士平均年龄37岁以上，十年寒窗，鲜见少年。特例不是没有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（622）的孙符伽，到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的刘春霖，可考的文状元计592人，少年状元屈指可数：宋代寇准20岁，欧阳修24岁，范仲淹27岁；明代费宏20岁，周延儒21岁。20岁结婚，古代属“晚婚”。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”，唐会昌三年（843）的状元郑元，是历史上唯一迎娶了公主的驸马。

科考路上对状元的追求，本质上是一种奋斗精神，也是一个地域人文精神的体现。凡是科举兴盛之地，必是人文昌盛之区。安庆地起大别山，枕天柱，临大江，溪河陂港汨号霁沸，沃野天造膏腴惠民，传统社会的安庆，极尽农耕工商之利，故而经济人文鼎甲江南。据《重修安徽通志·选举志》，明清时期安庆府共举文进士481人，位居全省前列，形成独特的人才现象。明清时期共有文状元203人，武状元114人，安庆府计有5人。据《光绪会典》卷四记载，全国设府（不含直隶州）185个，安庆府状元数不仅远超平均水平，并且文武双辉——既有文状元，又有武状元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传统科举退出历史舞台，传统的选官制度成为“过去式”。但是，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所言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客观、公平、竞争的科举模式，在当代高考以及各类人才选拔考试中，正以全新的内容、形式呈现出来。1952年，新中国开始探索新的高考制度。1977年，全面恢复高考制度。一切都在与时俱进，与时俱进，社会的现代化赋予了考试的崭新内容，科举形成的制度文明，依然在新时代熠熠生辉。

“状元文化”，是魅力持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也是安庆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一代又一代的学子，为“状元梦”而奋斗，也是为人生理想而奋斗，同样是为“中国梦”而奋斗。“状元文化”生生不息，由此呈现出现实意义。

一个创造出历史辉煌的地方，再创辉煌是应有之义。一个冷寂于历史的地方，未来的辉煌有待百倍的努力与付出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，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。”出类拔萃，勇为人先，安庆状元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安庆精神，也是安庆骨子里的自信。黄梅飘香，赴宴琼林，前贤精神是安庆最宝贵的遗产。

本版撰稿：章宪法